

徐志摩和新月诗人

摇晃的梦想

李伶伶——著

側看

側看
民國

民國

黃山書社

摇晃的梦想

徐志摩和新月诗人

李伶俐——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晃的梦想：徐志摩和新月诗人 / 李伶俐著. — 合肥：
黄山书社，2017.11
ISBN 978-7-5461-6923-1
(侧看民国)

I . ①摇… II . ①李… III . ①新月派 - 文学研究
IV . ①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1164 号

摇晃的梦想：徐志摩和新月诗人

YAOHUANG DE MENGXIANG: XUZHIMO HE XINYUE SHIREN

李伶俐 著

出 品 人 王晓光
总 策 划 董宁文
责任编辑 章锐华 徐娟娟
装帧设计 观止堂_刘 俊 朱 璇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22
书 号 ISBN 978-7-5461-6923-1
定 价 39.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 (<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开 篇

“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

这是胡适说过的一句话。显然，他是不屑做“狐狸”和“狗”的，也鄙视成群结队。以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崇尚独来独往，有心成为孤独的、高傲的“狮子”和“老虎”。然而，他为标榜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在情急之下所说的这句话，却让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设想：让老虎和狮子打一架，看看究竟谁赢谁输，谁才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这样的较量，理应是一对一的，一只狮子对一只老虎，这样才能比出真正的高低。如此狮虎斗的设想，原本就是人们主观的意愿，客观上不大可能有实现的一日，原因是，老虎固然擅长单打独斗，而狮子，却是成群结队的。

事实上，胡适独来独往的理想只停留在了书面上，或者口头上。生活中，他从来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老虎”。他的身边永远聚集着一帮朋友，不知有多少人将“我的朋友胡适之”视作荣光和骄傲。他的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新月”成员之一的梁实秋曾说，“新月”时代，他们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在胡家聚会。不经意间，胡适像……那样，像……那样，像……那样，时时成群结队。

反对拉帮结派，不愿意成群结队，似乎是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以自由和独立为立身根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处世准则。就算是“新月社”实实在在地成立了，“新月派”不折不扣地存在着，“社”里

的人，“派”里的人，也都不想、不愿承认，甚至完全否定以撇清自己和“社”和“派”有任何瓜葛和联系。

梁实秋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一口咬定：“新月根本没有派。”叶公超说，“新月社”不是一个正式的社团，而只是一个定期聚餐的一种集会。闻一多曾抱怨说：“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新月”后期诗人陈梦家在20世纪50年代“大鸣大放”期间，这样说：“现在还有人喜欢把过去的招牌挂在别人头上，比如‘新月派’诗人陈某某等。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太合适，当时我只不过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

也许“拉帮结派”这个词贬义的成分更大一些，但成群结队、结社成团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不为过。在中国文学史上，在“新月”存在的那个年代，社团繁杂，流派众多，组社团成流派一时间成为潮流。早先，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有创造社，“为艺术派”。之后，有语丝社，“语丝派”；有湖畔诗社，“湖畔诗派”。那么，新月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新月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派？“新月”的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却也耐人寻味；“新月”的人，进进出出，林林总总。这一切，都值得后人追忆。

目 录

开篇 / 1

第一章 徐志摩、胡适的聚餐会 / 3

徐志摩和梁实秋：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 / 3

徐志摩和胡适：透露了婚外恋 / 6

徐志摩和郭沫若：因“汨浪”结怨 / 12

胡适和郭沫若：“夕阳楼之争” / 17

石虎胡同 7 号：吃喝交谈的聚餐会 / 20

第二章 从“新月社”到“新月俱乐部” / 24

“诗翁”泰戈尔来了！ / 24

松树胡同 7 号：“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 / 48

第三章 新月社·现代评论社·周氏兄弟 / 56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 / 56

陈西滢和凌叔华：“新月”的一对夫妻 / 64

周作人心里的“绅士鬼”和“流氓鬼” / 73

战中的两个“和事佬”：徐志摩和胡适 / 87

第四章 《晨报副刊》，徐志摩的“喇叭” / 95

既是徐志摩的，也是新月社的《晨报副刊》 / 95

《晨报副刊·诗镌》：新月派的开端 / 101

《晨报副刊·剧刊》：“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 / 173

第五章 新月书店：一个股份制的出版公司 / 203

新月书店的始末 / 203

胡适任性“闹”退出 / 219

第六章 《新月》月刊：从文学到政治 / 227

《“新月”的态度》的态度 / 227

凌叔华、沈从文：两个“新月”小说家 / 233

徐悲鸿、刘海粟：两个“新月”美术家 / 244

潘光旦：唯一的“新月”优生学家 / 257

叶公超、梁实秋：“新月”文艺评论“双璧” / 269

胡适和罗隆基：在《新月》“人权风波”中沉浮 / 289

第七章 《诗刊》，《诗镌》之后的诗歌刊物 / 309

徐志摩和陈梦家：接力办《诗刊》 / 309

方令孺和方玮德：“新月”诗人中的一对姑侄 / 315

徐志摩和邵洵美：“诗坛双璧” / 321

第八章 《学文》，《新月》的继承者 / 332

叶公超和《新月》的最后岁月 / 332

叶公超和《学文》和卞之琳、季羨林、钱锺书 / 334

末篇 / 346



上部

前期“新月”

第一章 徐志摩、胡适的聚餐会

徐志摩和梁实秋：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

1922年8月，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了。他回国后参与的第一次社会活动，就是被清华文学社邀请去演讲。显然，这个时候的徐志摩已经被视为“名家”了，至少在清华文学社的梁实秋他们眼里，他就是名家。之所以如此，一来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不是什么人都能拜师梁任公的；二来徐志摩是留洋硕士——既是哥大硕士，又是剑桥皇家学院的高材生；三来徐志摩为追求自由和真爱，不理世俗，大胆地毅然决然地“抛弃”结发妻子的行为，使他名声大噪；四来徐志摩创作了大量新诗，以其特有的自由排列的形式，以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和奔涌飞扬的激情，使他迅速引起文坛前辈的关注和文学新人的景仰。简单地说，此时的徐志摩，才名满天下。因此，清华学子们都极想一睹他的风采。

出面邀请徐志摩的是梁实秋，不过，梁实秋并没有亲自去和徐志

摩面对面接洽。这倒不是因为徐志摩是名家，而身为学子的梁实秋不便莽撞地找上门去。当初文学社邀请周作人，就是梁实秋亲自摸到周府直言相邀的。再说了，梁实秋也不是那种仰视名家、畏惧权威的人。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于是，梁实秋通过梁思成去和徐志摩商量。据梁实秋事后回忆，徐志摩立刻就答应了。

徐志摩如此爽快，也不完全是因为梁思成。他天生好动、乐于交往、热衷参与，而且个性张扬、喜好表现。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显然，他是很看重“得到国内的认识”的。初归国，他满腹的才情，急于要表现；他已经确定的艺术人生观，急于想引起共鸣；他对于他的诗，他的文学理论，甚至他这个人，也急于要“得到国内的认识”。

这次演讲，是日后新月社两位主将徐志摩和梁实秋的第一次见面。梁实秋用“飘然而至”形容徐志摩的到来。这个词的确很符合诗人的气质。他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下巴很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外面是一件小背心，缀着几粒闪着金光的纽扣，脚上是一双黑缎鞋，尽显文质彬彬和潇洒神态。清华小礼堂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人数不比听周作人的少，黑压压一片。梁实秋说得不错，与其说他们是听众，不如说他们是观众——大多数人都是为“看”而来。

走上讲台，徐志摩旁若无人地自怀中掏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全英文的，然后坐了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后，准备开讲。听众（观众）们首先就被他手上的那一沓稿纸弄糊涂了：他这是要演讲，还是照本宣科？徐志摩解释道：“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 and 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这一下，学生们躁动起来。既然按照牛津的方式，那么，肯定是用英语的。之前，从来没有人直接用英语演讲过。这是一个不习惯。另外，按照牛津的方式，他是“宣读”，而非演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显而易见，演讲更随意些，而宣读则太正经。

“牛津的方式”，注定徐志摩的这次演讲是失败的。他的演讲（实则宣读）一开始，就有人退场。虽然他的口齿较周作人伶俐，乡音也不像周作人那么浊重，声音也够洪亮，但大多数人听不太明白。就连梁实秋，也自认“没有听懂他读的是什么”。徐志摩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自我陶醉着，尽管他坚持宣读，但语调变得夸张，手势也多了起来，表情更加丰富。于是，演讲显得有趣起来。但是，这个“有趣”，并非演讲本身，而是外在形式。当然，这样的有趣终究没有办法改变演讲失败的命运。

徐志摩自然不会在乎演讲的成功与失败，在他看来，能够完整全面地将他在留学生涯中特别是在剑桥所接受的西方社会思潮和文艺理论进行总结后“推销”出去，就是成功。按牛津的方式，学者们的宣读讲稿，在演讲完之后，是可以直接付印成书的。徐志摩的《艺术与人生》随后经挚友郁达夫之手，刊登在“创造社”的《创造季刊》第二期上，仍然是英文的。

梁实秋没有完全听明白，却完全看明白了。徐志摩认定眼前的中国社会“是一潭死水……一个由体质上的弱者、理智上的残废、道德上的懦夫以及精神上的乞丐组成的堂皇国家”。他用



创造社成员郭沫若（左二）、郁达夫（左三）和成仿吾（左四）

列举的方式，通过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雪莱、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瓦格纳、贝多芬等西方文艺大师的艺术成就，指责东方文化的贫乏，他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所以我们没有艺术。”可以想见，他的这番见解肯定会引起那些固守传统、拒绝接受外来文化和思想的老学究们的极大反感和不满。他的言辞固然激烈了一些，观点不免偏激了一些，理论也显得空泛了一些，但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

尽管梁实秋只把《艺术与人生》当作通俗性的一般文章，而非学术研究论文，但他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是很认同的，特别是他对徐志摩在文章中透露出的反叛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忧虑以及因此忧虑而提出的“要丰富、扩大、加强、激化我们的生活，赋予它精神上的意义，恢复我们的审美直觉和创造活力”的主张，是极为赞赏的。这也许是他俩日后能够共同参与新月社的思想基础。

徐志摩和胡适：透露了婚外恋



徐志摩送给胡适的签名照

在胡适的眼里，徐志摩是一个可爱的人，是“一片春光”，是“一团火焰”。在徐志摩的眼里，胡适是一个温暖敦厚、令人尊敬的师长，也是一个可以在一起“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的亲密伙伴。如果说徐志摩是日后新月社的灵魂的话，那么，胡适就是新月社的领袖。当然，在新月社之前，他俩只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挚友，一对能够宽容彼此的密友。

“新月”之前徐志摩和胡适相交的基础，除了对白话诗的共同迷恋外，

恐怕应该算是对政治的共同喜好。当然，这个“喜好”，有程度上的大不同。

和徐志摩一样，胡适也曾留学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徐志摩取得了硕士学位；胡适虽然提交了博士论文，也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笔试与口试，却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拿到博士学位。自美返国后，他一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于是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在一个原本就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屑谈政治的人的眼里和心里，是不会有“政治”这个概念的，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宣称。由此看来，他原本就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而且很愿意谈政治的人。

果然，不要说“二十年”，甚至不到两年，胡适就将他的誓言甩在了脑后，忍不住要谈政治了。1919年6月，他在陈独秀被捕后接办《每周评论》，不满于国内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高潮盖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写了一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客观地说，那个时候，他谈政治，并非一心求官，而是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如果说，“问题和主义”是他谈政治的开始的话，那么，他在1921年5月组织“努力会”，一年之后创办《努力周报》就成为他谈政治的明显标志。从此，《努力周报》成了他谈政治的阵地，也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提供了一个平台。

徐志摩在哥大经济系就读时，选修课程偏重政治。那时，他不仅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也对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颇感兴趣，又研究了一番社会主义，于是他的书架上多了几本“讲苏俄一类的书”。事实上，他对政治的兴趣，和胡适对政治的兴趣，是不一样的。他的心思活，感情充沛，对所有“新”的东西充满探寻的欲望。因此，当他由美抵英后，又开始欣赏起英国政治来了，自认是“恭维英国政治的一个”。他不仅赞美英国政治，甚至幻想中国也能走英国政治的道路。

从徐志摩对政治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他对政治的兴趣实际上只

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而没有进入政治的核心，因此成不了一个冷峻的政治家。他刚刚回国就遇到了一次政治事件，以他当时激情四溢充满理想主义的状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亟欲纸上谈兵一下的。

这次政治事件，简单地说，就是财政总长罗文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实际上，事件背景很复杂。

胡适在《努力周报》创刊时特别写了一首《努力歌》：“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在这里，胡适第一次用了“好人”这个词。这个时候，他正怀有要建立“好人政府”的理想，意即政府要由一帮“好人”组成，并且经过这些“好人”的奋斗而出现“好政府”。两个月以后，他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叫“好政府主义”。之后，他应邀为“双十节”写了一首诗，名为《双十节的鬼歌》，诗中有这样一句：“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为了这个“好人政府”，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成一篇《我们的主张》。这实则一篇呼吁政治改革的宣言，引起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元培、罗文干、梁漱溟、陶行知、王宠惠、李大钊、汤尔和等人的积极支持，并重新定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政治改革的目标是确立“好政府”；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是号召“好人”们出来干政治，组织政党。

很明显，胡适的“好人”组成“好政府”，从而建立“好人政府”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但是，有意思的是，胡适的“好人政府”的理想真的实现了。就在徐志摩由英启程回国的时候，“好人政府”成立了！“好人”王宠惠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好人”罗文干任财政总长；“好人”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为此，胡适着实兴奋了一下。

为什么说“一下”呢，因为这个“政府”太短命，只维持了几个月而已。新内阁的后台是吴佩孚，而国会的后台是曹锟。新内阁的成



1916年，胡适（前排左一）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同学合影。第三排右四是陶行知

立，自然是针对国会的，因此两方不可能没有矛盾而和平相处。因在经费分配和借款等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原本就潜在的矛盾完全公开了，最后导致决裂。由参议院院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等一手策划，人为制造了罗文干“卖国纳贿”丑闻，在取得总统黎元洪的手令后，将其逮捕。但因证据不足，罗不久被释放。但是，教育总长彭允彝为讨好吴、张，在国会会议上又提议，将“罗案”交由法院处理。就这样，罗文干重新被捕。

罗文干的被捕，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罗任教的北大。作为北大校长、罗文干的密友，蔡元培更公开断言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同时，他称他坚信罗文干的操守。为斥责这种卑劣行为，也为声援罗文干，蔡元培提出辞呈，并发表声明表示对民国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随即离京。接着，北京学联向民国政府请愿，

要求惩办“罗案”制造者，释放罗文干。

不用说，在这次政治事件中，胡适肯定是站在罗文干这一边的。他在192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今天突起一大政潮，颇骇人听闻”，并且在日记里粘贴了两份刊登着这则事件的报纸，一份是《北京晚报》，一份是《京津晚报》。随后，在次年1月份他主编的《努力周报》上，连续编发了几篇倾向性很明显的政论。他自己在文章中直言不讳道：“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这一个无耻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彭允彝代表‘无耻’。”“代表无耻”这句话，成为胡适的“名言”。

另外一篇是徐志摩撰写的《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

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公平、道义、人格的立场对蔡元培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认为蔡元培是在“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因而极具牺牲精神，令人感佩。他又说：“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衷心的同情。”所以，他号召“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看得出来，此时的徐志摩满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勇气，又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徐志摩是在什么时候和胡适相识的？目前似乎已经很难确定。可以推断，在徐志摩发表这篇文章之前，胡适对“徐志摩”应该有所耳闻。至于“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大名，对于徐志摩来说更应该如雷贯耳。也可以揣测，正是因为徐志摩的这篇文章，两人得以结识，并一见倾心，随后共同组织了聚餐会和后来的新月社。

准确地说，徐志摩的那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的文章刊登在1923年1月28日的《努力周报》上。然而，“徐